

# 雙重身分的挑戰： 軍隊社會工作實務的倫理議題

嚴巧珊

## 壹、前言

「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軍隊存在的目的在於維護國家安全。為了維繫軍隊戰力就必須完善軍隊輔導工作，而軍隊社會工作就是源起於軍隊發展需要，為重視國軍官兵個人存在價值，特加強各項服務以維護基本權益、增進福利措施，以安定官兵生活（朱美珍，2012）。目前，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以下簡稱國軍心輔工作）是軍隊社會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意即軍隊社會工作者主要投身於國軍心輔工作（吳嘉蓉、宋麗玉，2018；郝溪明，2003；陳依翔，2017）。國軍心輔工作始建立於民國80年，目的是因應當時社會環境變遷與軍隊輔導需求而設立，之後於民國88年為配合部隊組織結構調整，完成國軍心理衛生（輔導）「三級防處體系」及「區域輔導網絡」建構並執行迄今，主要以「初級發掘預防」、「二

級專業輔導」，以及「三級醫療處遇」來促進官兵心理健康及防範自我傷害事件。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初級發掘預防」工作中主要擔任連輔導長、營輔導長等職務，屬於第一線輔導和危安預警人員；在「二級專業輔導」主要執行專業諮商輔導工作，並提供基層幹部教育諮詢與協助個案轉介工作；在「三級醫療處遇」中則任職於「地區心理衛生中心」，發揮危機處理與密集輔導作為，並整合矯治、醫療與心理重建之功能（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註1）。

國軍心理衛生（輔導）「三級防處」機制屬於「嵌入作法」（顏志龍、陳彰儀，2003），將心輔工作紮根於各基層單位，並透過指揮系統落實輔導回報機制，以協助各級單位發掘、掌握與輔導個案（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然而，嵌入的心輔機制讓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獨力完成單位輔導工作，也別無選擇地

必須為單位長官、朋友、部屬進行輔導，容易造成軍隊社會工作者與個案的輔導關係、管理職責出現混亂（丁華等人，2012；Johnson et al., 2006; McCauley et al., 2008）。再者，軍隊領導者可能對輔導工作的方法與倫理知之甚少（Hryshko-Mullen et al., 2022），軍隊社會工作者卻因直接隸屬於服務單位的指揮鏈，而必須聽從單位領導者的命令、遵循科層制度的規範，社工專業倫理的空間因而受到限制（陳依翔，2017；Bakst, 2015）。

軍隊社會工作者不僅是社會工作者也是軍人，身為社會工作者有義務遵守並明確闡述社會工作價值觀、倫理原則與標準。身為軍人也同樣必須遵守軍事道德、價值觀和法律（Bakst, 2015）。然而，雙重身分讓軍隊社會工作者在遵循軍事組織規範和專業倫理之間經常出現衝突。這樣的衝突與其說是個人對抗權威，不如說是科層制度和專業精神的衝突，亦或是專業價值與軍事使命的兩難。有鑑於此，本文透過整理國內外現有文獻資料，進一步分析在現今軍事環境中，社會工作專業倫理與軍事體系互動所產生的倫理議題為何？並據以討論與提供建議。

## 貳、「軍職」、「社工」雙重身分的挑戰

軍隊社會工作者因同時具有「軍職」

與「社工」雙重身分，除了幫助和支持服務對象之外，亦須關注軍事組織的利益和目標而面臨許多衝突與挑戰（林於宏，2021；陳依翔，2017；Bakst, 2015; Sásik, 2021）。因為輔導以人為本，但是軍隊組織以任務為先，即使輔導看到個別差異與需求，軍隊卻期待能透過各種訓練與紀律要求消弭個別差異（顏志龍、陳彰儀，2003）。不僅如此，在時代變遷下，隨著募兵制推動以及千禧世代軍人的加入（邱發忠、鍾成鴻，2021），加上數位媒體發展快速，官兵爆料文化的興起，都影響了組織溝通與軍事制度的變革（簡志翔，2020）。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實踐社工專業倫理時也必然受到影響。本文蒐整過往相關研究，將「軍職」、「社工」雙重身分的挑戰區分為：科層制度下的權力操控、「軍事」與「社工」價值觀的拉扯，以及新時代部隊的挑戰等三項予以討論。

### 一、科層制度下的權力操控

軍隊是「全控式組織」，意即在軍事科層組織規範下，透過權力和階級制度維繫具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的規範要求，進而使軍事成員對服從、階級與權威的高度重視，以形成團隊意識（錢淑芬，2013）。軍隊中的個人必須配合團體行動，必要時還需犧牲個人權益以滿足團體要求，以追求軍事任務順利遂行（余一鳴，2003；孫敏華，2001；Bryan et al.,

2012)。透過階級權力關係定義組織內每個人的角色和地位至關重要，如此軍隊成員才得以確定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和地位，並表現出適當的行為（顏志龍、陳彰儀，2003）。

軍隊社會工作者被期待的角色定位，就是準確掌握單位成員的所有狀況，並透過指揮體系回報狀況，以利單位人員心緒狀況的掌握（邱發忠、陳學志，2003；張沛文，2016）。在科層制度下，權力操控於單位領導者手中，不論單位領導者是否具備心輔專業能力，軍隊社會工作者基於職務服從必須聽從命令（黃勝為，2005；Hryshko-Mullen et al., 2022），個案的輔導作為都必須聽從單位領導者的指導，軍隊社會工作者往往只能提供處置建議（林於宏，2021；張沛文，2016；顏志龍、陳彰儀，2003），心輔工作的自主性當然也受到忽略（林宇明，2005；邱保龍，2007；張沛文，2016；黃勝為，2005）。就現況而言，階級權力相對弱勢的軍隊社會工作者終究僅能聽命行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的堅持仍不敵職務領導下的權力操控。軍隊科層制度的確有利於軍事任務的傳達與遂行，卻難以兼顧專業心理輔導工作的自主性。

## 二、「軍事」與「社工」價值觀的拉扯

軍事組織的利益是超過個人利益的（余一鳴，2003；顏志龍、陳彰儀，

2003），軍隊養成教育訓練影響甚深，團體生活、軍事教育都影響到專業工作推行，以及專業倫理決策判斷（林宇明，2005）。尤其，軍隊透過系統性的訓練方式，將軍事信仰體系、價值觀、文化長期灌輸於軍隊成員，軍事使命至高無上、服從階級權威已然內化（錢淑芬，2020）。再加上軍隊社會化與其他社會化最大不同，在於軍隊社會化有極高的強制性，例如：行動要求一致，一切以團隊為重，若隨意違背就會受到相應的紀律處罰、行政處分等作為，都是型塑出軍事成員堅固軍事價值信念的策略（余一鳴，2003）。同樣地，軍隊社會工作者也接受正規社會工作教育，必須遵守社會工作倫理規範。以提升軍隊成員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福祉，並發展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個案尋求恢復功能失調的連接功能（朱美珍，2012；Sásik, 2021）。這樣的雙重身分產生許多不協調和衝突，亦產生許多壓力（丁華等人，2012；Olson, 2014; Linnerooth et al., 2011; Sásik, 2021）。所以，是要幫助和支持服務對象？還是以軍事組織的基本利益和目標為重？在「軍事」與「社工」不同價值衝突下，軍隊社會工作者受困於個案與軍隊組織利益權衡之中。

## 三、新時代軍隊的倫理議題

隨著募兵制推動以及千禧世代軍人

的加入（邱發忠、鍾成鴻，2021），以及新媒體時代快速發展的網路社群，都讓軍隊社會工作受到更多倫理議題的考驗。相關研究發現，在募兵制推動後，隨著服役期程拉長，以及社會變遷等影響下，軍隊個案類型趨於複雜，包括：物質濫用、家庭問題、精神疾病、同志議題等（丁華等人，2012；于子堯，2013）；千禧世代軍人的加入，由於更重視自我發展與個人自由，軍事權威式管理受到考驗（Stafford & Griffis, 2008），加上網路科技以及智慧型行動裝置發展迅速，部分官兵也會透過體制外管道表達意見（簡志翔，2020）。

然而，對於企圖維持保守的軍事組織而言，軍隊社會工作者更陷入倫理困境中（陳依翔，2017）。軍事組織面對新型態社群媒體言論的發展，軍事組織「神秘面紗」被動地被揭穿，尤其軍人行為舉止容易被放大解讀，甚至受到不實訊息的攻擊，軍事組織並不樂見此現象（簡志翔，2020；羅凱倫，2022）。尤其，軍隊在遇上「多元性別」議題時總表現相當保守或隱晦，現今社會在同婚專法的施行及多元性別觀念的推展下，軍隊反而更擔憂「軍隊多元性別」議題引發媒播效應，而無意願涉入其中（謝枝旺、王秋鳳，2021）。

軍隊社會工作者身處軍事科層體制之中，在獎懲制度下亦須顧及自身的升遷發展，更要注意避免抵觸單位長官的命令

而受到懲處（周哲銳，2014）。檢視國軍2017年頒布的《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針對工作倫理規範，包括：摒除個人私慾、公平正義原則、充實專業知能、專業敬業樂業、謹守言行紀律、夥伴平等關係、協助解決困境，以及發揮團隊精神等要求（國防部，2017）。顯示出心輔人員被期待能兼顧組織和個案權益，卻沒有提及倫理難題的因應方式。可見，軍隊社會工作者處在一個變動的外部環境，與相對保守的軍事科層組織之中，如何平衡與兼顧個案、自我和組織利益仍是一項難題。

## 參、軍隊社會工作實踐的倫理議題

社會工作過程中主要的「倫理議題（ethical issues）」可分為三種：（一）無心犯下的錯誤，如：資料保管失當、不小心洩漏案主資料；（二）不當行為有違社工倫理規範，如：剝削案主、與案主互動超出專業界線；（三）倫理兩難（芮默·弗雷德利，2009）。「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意即：

決策者必須在兩個價值接近或相等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的困境。若軍事社會工作者必須在軍事使命和個案之間做出選擇，就會體現出軍隊系統中社會工作者的矛盾。（Tallant & Ryberg, 2000）

軍隊社會工作者在軍隊相關規範與社工專業倫理的衝突下，的確出現許多倫理議題（李霖；2020；邱保龍，2007；陳依翔，2017；Bakst, 2015; Linnerooth et al., 2011），本文彙整文獻資料後，發現軍隊社會工作實踐的倫理議題可區分為：「案主自決與家長主義的兩難」、「保密、隱私權與軍隊科層體制的兩難」，以及「多重角色的衝突」等三項。

### 一、案主自決與家長主義的兩難

根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工員提供服務時，必須尊重案主的選擇。然而，軍隊社會工作者基於職責，必須將個案、服務單位和軍隊組織視為一個整體，忠於三者並兼顧一切。軍隊領導者就像個案在軍隊的監護人，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重視其意見（Bakst, 2015）。在軍隊組織中，軍事領導者為了確保組織行政效率、強化訓練成效，軍隊成員除了做好自身工作之外，表現出利他行為也是極為重要。

「家長主義」讓軍事領導者對其部屬有絕對權威，而部屬須對單位領導者以絕對的服從予以回應（許金田等人，2004）。

國內多篇文章均提到，軍隊社會工作者依規定須將個案問題和處置建議向上呈報，再由單位長官指示個案後續輔導作為，例如：個案是否要轉介醫療、轉換職涯，或是調職等處置作為，軍隊社會工作者往往只是程序上的背書者，並無決

定權（林宇明，2005；崔艾湄，2019；張沛文，2016；黃勝為，2005；謝枝旺、王秋鳳，2021），因為決策權始終掌握在「權責長官」手中（林於宏，2021）。再加上社群媒體日益普及後，軍中事務若遭到外界媒體過分關注和渲染，就會危及軍隊形象，輔導過程的掌控更受到軍隊領導者的重視（林宇明，2005）。如崔艾湄（2019）研究發現，軍隊社會工作者一旦發現單位有愛滋病感染者、同性戀者，甚至僅是一般的心輔個案都要依規定向單位長官報告，目的就是希望能解決單位的問題，而非專注於協助個案解決問題。謝枝旺與王秋鳳（2021）研究部隊多元性別者的輔導經驗，也提到單位長官會介入個案輔導作為，如：希望透過輔導來調整個案的性傾向，或是透過住院、通知家屬和辦理停役。

事實上，大多數具有指揮權責的軍隊領導者並無心輔相關專長（黃勝為，2005），卻基於職務、階級服從，軍隊社會工作者只能聽命行事，「以個案為中心、案主自決」的價值理念往往受到忽略。單位長官掌握個案狀況的最終目的仍是解決單位問題，以獲得組織最大利益，相關個案輔導作為仍是以維繫單位整體安全為目標。在軍隊從事輔導工作，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服從於階層權力關係之中，並掙扎於案主自決，或是聽命行事的兩難之中。

## 二、保密、隱私權與軍隊科層體制的兩難

軍隊社會工作者受雇於軍事組織，在實務過程必須遵守軍事組織的規範和命令。我國軍隊心理輔導是「嵌入式」的輔導機制，在國軍心理衛生（輔導）「三級防處體系」及「區域輔導網絡」輔導規範下，個案輔導紀錄必須逐級上呈由各級長官批閱，在單位個案研討會議中也必須提出報告，以利單位各級長官掌握個案狀況，導致個案輔導過程自我揭露的隱私因而被公開（吳國中、陳俊源，2014；林宇明，2005）。就軍隊立場，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落實「邊處理、邊回報」的流程，讓各級長官即時掌握單位成員所有訊息，以防止軍隊出現任何軍紀問題，避免內部管理被檢討（崔艾湄，2019；陳依翔，2017；謝枝旺、王秋鳳，2021）。相較之下，個案隱私較不被重視（林宇明，2005；崔艾湄，2019；張沛文，2016；謝枝旺、王秋鳳，2021；Simmons & Rycraft, 2010）。

因為「服從」終究是軍事組織重要的核心概念，透過軍事社會化影響軍隊成員價值觀，以達效忠軍事使命為目的（邱發忠、陳學志，2003）。透過軍隊科層體制的規範，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為單位發掘危安問題，避免個案個人問題影響單位任務遂行（崔艾湄，2019；陳依翔，2017；

Johnson et al., 2010）。當軍隊社會工作者選擇為個案保密時，總會因違反科層體制要求而背負責任，因為社工專業倫理無法突破「官僚權威」，在滿足軍事任務順利遂行的前提下，社工專業倫理時常會被漠視（黃富民，2019），導致軍隊社會工作者迫於現實壓力，必然得成為一位順從、聽命行事的部屬（周哲銳，2014；陳依翔，2017）。

然而，忠誠度必然是信託關係的核心，維護個案隱私和對個案誠實更是對案主忠誠的義務（Kutchins, 1991）。軍隊社會工作者應該與個案建立互信的關係，才有利於深入了解個案問題，進而解決個案問題。所以，到底是要維護個案隱私，還是要滿足軍隊科層體制的規範，對於個案基於信任全盤托出的「秘密」，軍隊社會工作者該如何信守對個案的保密承諾？甚至，軍隊社會工作者服務的「個案」到底是誰？是整個軍事組織，還是軍隊成員？這是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議題，卻也是迄今難解的難題。

## 三、多重角色的衝突

什麼是多重關係？當輔導者同時或依次參與個案的兩種或多種關係時，就會出現多重關係，而當兩個角色之間存在實質性差異或衝突時，對個案的潛在傷害會加劇（Kitchener & Anderson, 2011）。在社會工作專業關係中，經常會以堅守專業

界線、避免雙重關係、不能違反倫理守則為前提（潘淑滿，2000），專業關係更應該建立一種雙向的溝通，並且產生「信任」與「安全感」（Biestek, 1957）。然而，軍隊心理輔導屬於「嵌入式」的輔導機制，服務對象就是軍隊社會工作者服務單位的長官、同事或是部屬，與服務個案產生雙重甚至多重關係根本無法迴避。這也意味著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時刻準備好轉換自身角色，隨時要為自己的長官、朋友、部屬提供服務（Johnson et al., 2006）。但是，一旦軍隊社會工作者和個案在期望、義務和權力方面的差異增加，雙方產生誤解、失去客觀性和剝削的可能性就會增加（Kitchener, 1988）。

相關研究就指出，階級是很難跨越的限制，通常接受輔導的個案階級大多為低階的志願役士兵，校級以上的軍官通常會拒絕接受輔導。因為大多數輔導人員的階級為上尉、少校，在階級服從、職務領導的軍事環境中，高階者向低階者求助會影響到領導威信，要接受低階者的心理輔導更令高階者難以接受（丁華等人，2012；李霖，2020；邱保龍，2007）。相反地，低階者基於服從必須接受輔導，但是非自願性的個案在輔導上同樣困難重重。因為，即使低階的個案被迫接受輔導，談話內容也多有保留、配合度也不佳（林宇明，2005；謝枝旺、王秋鳳，2021）。被「長官」輔導，就像是將自己的問題攤

在陽光底下，所以大多數官兵會擔心個人資料保密問題、會被標籤為有問題的人，甚至影響個人軍旅生涯發展等問題，所以不太願意接受輔導，或是多有保留，專業關係難以被建立（丁華等人，2012；吳國中、陳俊源，2014；李霖，2020；林宇明，2005；崔艾湄，2019）。

對於軍隊社會工作者自身而言，因為同時具有軍職與社工身分，在講求軍事任務、軍事職責為重的軍事組織中，輔導身分只是次要角色，「長官的部屬」才是其主要角色（顏志龍、陳彰儀，2003）。要彰顯自身價值，就必須有效協助軍事任務達成，其輔導成效才可獲致肯定。若是個人內在價值觀的衝突、輔導過程無法長期獲得成就感，都讓軍隊社會工作者陷於內在衝突與矛盾之中（周哲銳，2014；林宇明，2005），甚至輔導的熱情都被澆熄（于子堯，2013）。可見，不可避免的多重關係侷限了軍隊輔導工作的推展，輔導所需存在的信任關係也難以建立，輔導者與個案存在多重關係，加上彼此權力的差異，都讓軍隊社會工作者深陷於倫理困境之中。

## 肆、討論與建議

社會工作是兼具科學與藝術的助人專業，透過專業技術、經驗和直覺，以及助人的渴望，讓當個案進到輔導關係中

可以得到幫助，或者至少不會受到傷害（Graybeal, 2007）。然而，軍隊是強制性極高的「全控式組織」，透過階級制度維繫具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的規範，軍隊所屬成員都必須服從於軍事命令（余一鳴，2003；錢淑芬，2013；Bryan et.al., 2012）。尤其，獎懲、升遷權力都掌握在單位領導者手上，也箝制了軍隊社會工作者專業自主的發展（周哲銳，2014；陳依翔，2017）。加上現今網路科技及智慧型行動裝置發展迅速，部分官兵向體制外管道表達意見（簡志翔，2020），輔導機制被期待成為知悉官兵想法的管道，並且效忠於單位指揮官、遵循科層制度的規範，不任意對外透漏輔導相關訊息（張沛文，2016）。本文認為，目前軍隊組織結構並未重視軍隊社會工作實務的倫理議題，導致軍隊社會工作者與個案無法建立具「信任」和「安全感」的專業關係。若國軍期待輔導機制能獲得單位成員的認同，就需要在教育訓練、管理與督導，以及完善專業制度上提出改善策略。

首先，加強軍事領導者的「社會工作倫理」教育。目前軍事領導者大多數不具備輔導相關倫理知識，也沒有相關訓練課程。當軍事領導者對社會工作倫理沒有足夠認識時，就會以一般領導模式去看到輔導工作。因此，唯有加強軍事領導者的社會工作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才能讓軍事領導者了解到倫理對社會工作服務品質維持

的重要性，以利軍隊社會工作倫理規範的落實。

**第二，建構專業督導制度。**前述發現，軍隊社會工作者在面對社會工作倫理議題時都沒有提及專業督導的協助。的確，軍隊輔導工作並沒有「長期、密集且持續性」的督導制度，依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現行做法，以「專業督導團體」協助提升心輔專業能力及實務技巧，專業督導人員是由民間學者專家或是資深心輔官擔任（國防部，2017）。這樣的督導機制並不足以應付繁雜的軍隊輔導實務工作，也無法提供即時的協助。因此，未來國軍應建立「長期、密集且持續性」的督導機制，才能提供更全面的支持與協助。

**第三，建構軍隊社會工作倫理決策。**目前並沒有明確的倫理決策模式可供軍隊社會工作者遵循，導致軍隊社會工作者長期游移於軍隊相關規範與社工專業倫理規範中。在軍隊科層制度下，軍事領導者對其部屬有絕對權威，而部屬須對單位領導者以絕對的服從，即使軍隊指揮官的要求與社會工作倫理規範相違背，也只能依據軍隊科層制度的規範聽命行事。身為軍隊社會工作者不能漠視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的明確要求，特別是「嵌入式」的心輔機制更應確遵職業倫理，當倫理困境發生，軍隊社會工作者為倫理決策制定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至關重要，對未來軍隊社會工作的推展大有裨益。



軍事任務要有效遂行，軍隊社會工作具有其重要性，而軍隊社會工作要受到肯定，也必須能有效協助軍事任務順利達成（孫敏華，2001）。軍隊社會工作若要走出倫理困境，就必須接受軍事組織的特殊性，以滿足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對個案、對同僚、對服務機構，以及對社會大眾的義務和職責。未來，軍事組織應建構更完善的心理輔導專業體制，透過持續教育訓練與專業督導制度建立，讓軍隊社會工作者在遇到倫理困境時可以獲得專業的協助，以更全面的觀點作出更適切的處置作為。同時，國軍建立一套軍隊倫理決策模式也是未來可以推展的方向，律定清楚的倫理決策模式讓軍隊社會工作者依循，可以避

免指揮體系的過度干預，也避免軍事價值與社工倫理間的過度拉扯。總而言之，軍隊社會工作者雙重身分的挑戰必然存在，與其和現有制度抗衡，不如思考如何發展出個案與軍事組織利益共存的服務決策。因為，徬徨不安的軍隊社會工作者無法有效解決個案的問題，唯有面對、處理問題，並透過組織共同面對與做出相因應的策略，軍隊社會工作才能發揮更大的功效。

（本文作者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軍隊社會工作、心理衛生、科層制度、倫理議題

## 註 釋

註1：本研究僅討論軍職社會工作者，不包含聘僱的文職社會工作者，因文職社會工作者不具軍職身分，不屬於本文研究議題所討論的對象。

## 參考文獻

- 丁華、胡正申、林冠萍（2012）。〈國軍志願役軍人輔導工作：困境與對策〉。《國防雜誌》，27（4），116-130。[https://doi.org/10.6326/NDJ.2012.27\(4\).8](https://doi.org/10.6326/NDJ.2012.27(4).8)
- 于子堯（2013）。《陸軍心輔官工作壓力、專業承諾與工作滿足感關聯性之研究》（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47jn22>
- 朱美珍（2012）。〈迷彩服下的助人工作——談軍隊社會工作〉。《社區發展季刊》，137，199-207。
- 余一鳴（2003）。〈軍隊社會化的理論與實際〉。《復興崗學報》，77，219-246。

- 吳國中、陳俊源（2014）。〈國軍，社區及學校三級輔導制度之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48（1），99-116。[https://doi.org/10.6237/NPJ.201402\\_48\(1\).0009](https://doi.org/10.6237/NPJ.201402_48(1).0009)
- 吳嘉蓉、宋麗玉（2018）。〈優勢觀點在軍隊社會工作應用之初探〉。《臺灣社會工作學刊》，20，77-107。
- 李霖（2020）。《國軍心理輔導人員職涯發展之研究：以金門地區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a9mqzm>
- 芮默·弗雷德利（Reamer, F.）（2009）。《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三版）（包承恩、王永慈，譯）。洪葉。（原著出版年：2006）。
- 周哲銳（2014）。《從軍隊特殊之組織文化解析「洪仲丘案」》（碩士論文，佛光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c3m5nz>
- 林宇明（2005）。《國軍心理輔導人員專業工作推行與專業倫理決策過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246p2q>
- 林於宏（2021）。《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倫理決策模式之研究》（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p8kn34>
- 邱保龍（2007）。《國軍心輔官輔導工作經驗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d43zv6>
- 邱發忠、陳學志（2003）。〈軍事服從態度量表發展暨其效度之研究〉。《復興崗學報》，79，79-106。
- 邱發忠、鍾成鴻（2021）。〈國軍新時代組織管理與心輔工作之挑戰與前瞻〉。《軍事社會科學專刊》，18，7-28。
- 孫敏華（2001）。〈當前軍中心理衛生（輔導）工作的回顧與展望〉。《軍事社會科學學刊》，199-216。
- 郝溪明（2003）。〈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制度之建立與規劃〉。《社區發展季刊》，101，474-486。
- 國防部（2017）《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第三版）。
-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年1月1日）。〈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發展沿革〉。政戰資訊服務網。<https://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131&p=6084>
- 崔艾湄（2019）。〈軍隊助人者協助多元性別從軍者的輔導困境與挑戰：性別觀點的分析〉。《復興崗學報》，114，127-156。
- 張沛文（2016）。《陸軍基層輔導長輔導工作方法、困境與因應》（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3x43ed>
- 許金田、胡秀華、凌孝綦、鄭伯壘、周麗芳（2004）。〈家長式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上下關係品質之中介效果〉。《交大管理學報》，2，119-149。

- 陳依翔（2017）。《雙重忠誠的束縛-軍隊社會工作的存在與建構》（博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78g487>
- 黃勝為（2005）。《軍隊社會工作倫理兩難問題之研究》（碩士論文，政治作戰學校）。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eju6zss>
- 黃富民（2019）。《號角響起，彩虹再現：一位心輔官性態度重建歷程之自我敘說》（碩士論文，樹德科技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997k7m>
- 潘淑滿（2000）。《社會個案工作》。心理。
- 錢淑芬（2013）。〈全控機構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化：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初官養成教育的模塑制度為例〉。《復興崗學報》，103，147-174。
- 錢淑芬（2020）。〈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之職能導向初探〉。《復興崗學報》，117，53-68。
- 謝枝旺、王秋鳳（2021）。〈多元性別從軍者的輔導作為之研究〉。《軍事社會科學專刊》，18，57-80。[https://doi.org/10.6915/PMSS.202103\\_\(18\).0005](https://doi.org/10.6915/PMSS.202103_(18).0005)
- 簡志翔（2020）。《探討國軍人員參與社群媒體與組織信任關聯性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原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86m4ua>
- 顏志龍、陳彰儀（2003）。〈美軍的心理衛生工作簡介及其對國軍之啟示〉。《復興崗學報》，79，55-78。
- 羅凱倫（2022）。《新媒體時代軍事組織對於社群言論回應機制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nj2n22>
- Bakst, S. E. (2015). *Exploring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dual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Master's thesis, Smith College]. Smith College. <https://Scholarworks.smith.edu/theses/704>
- Biestek, F. P. (1957). *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 Bryan, C. J., Jennings, K. W., Jobes, D. A., & Bradley, J. C. (2012).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military suicide.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16(2), 95-110. <https://doi.org/10.1080/13811118.2012.667321>
- Graybeal, C. T. (2007). Evidence for the art of social work. *Families in Society*, 88(4), 513-523. <https://doi.org/10.1606/1044-3894.3673>
- Hryshko-Mullen, A. S., Behnke, S. H., Ogle, A. D., Rogers, T. E., Tubman, D. S., Rowe, K. L., & Dunkle, A. N. (2022). Embedded behavioral health in the U.S. Air Force: Addressing the ethics of an expanding area of practi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53(1), 59-68. <https://doi.org/10.1037/pro0000423>
- Johnson, W. B., Bacho, R., Heim, M., & Ralph, J. (2006). Multiple-role dilemmas for military ment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Military Medicine*, 171(4), 311-315. <https://doi.org/10.7205/MILMED.171.4.311>

- Johnson, W. B., Grasso, I., & Maslowski, K. (2010). Conflicts between ethics and law for military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Military Medicine*, 175(8), 548-553. <https://doi.org/10.7205/MILMED-D-09-00119>
- Kitchener, K. S. (1988). Dual role relationships: What makes them so problematic?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67(4), 217-221.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1988.tb02586.x>
- Kitchener, K. S., & Anderson, S. K. (2011). *Foundations of ethical practice,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2nd ed.).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 Kutchins, H. (1991).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The legal basis for social workers' responsibilities to clients. *Social Work*, 36(2), 106-113.
- Linnerooth, P. J., Mrdjenovich, A. J., & Moore, B. A. (2011). Professional burnout in clinical military psychologists: Recommenda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deployment.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1), 87-93. <https://doi.org/10.1037/a0022295>
- McCauley, M., Hughes, J. H., & Liebling-Kalifani, H. (2008).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military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 review of selected literature. *Military Psychology*, 20(1), 7-20. <https://doi.org/10.1080/08995600701753128>
- Olson, M. D. (2014). Exploring the ethical dilemma of integrating social work values and military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59(2), 183-185. <https://doi.org/10.1093/sw/swu010>
- Sásik, C. (2021). Social work in military setting. *Honvédségi Szemle—Hungarian Defence Review*, 149(1-2), 80-91. <https://doi.org/10.35926/HDR.2021.1-2.6>
- Simmons, C. A., & Rycraft, J. R. (2010). Ethical challenges of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serving in a combat zone. *Social Work*, 55(1), 9-18. <https://doi.org/10.1093/sw/55.1.9>
- Stafford, D. E., & Griffis, H. S. (2008). *A review of millennial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ilitary workforce implications*. CNA Corporation.
- Tallant, S. H., & Ryberg, R. A. (2000). Social work in the military: Ethical dilemmas and training implications. In J. G. Daley (Ed.),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military* (pp. 179-204). Haworth.